



乔装打扮、神出鬼没，总能想方设法拿到旁人拿不到的资料，看到旁人看不到事实——这些人，就是一直笼罩在神秘面纱下的私人侦探。2010年9月1日，“东方摩斯商务调查中心”的两名私人侦探，因接受委托进行婚外恋跟踪拍摄业务，查询他人的银行账户、房产等隐私信息，被带至北京海淀法院受审。这是我国司法机关首次以“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”这一新罪名追究私人侦探的刑事责任。这则新闻，让不少人感到意外——私人侦探，难道一直在打法律的擦边球？



“中国第一私人侦探”孟广刚

私人侦探：曾有从业者被殴致死

在调查过程中，他们经常使用窃听、偷录等非法手段
他们成了“二奶”克星，存在中国20年，仍难摆脱“黑户”身份

【形象要求】扎进人堆就找不着

在一位律师朋友的引见下，赵晓(化名)终于答应和记者见面。他倒真没什么特别之处，中等身材、相貌平凡，扎进人堆就找不着，可这正是成为私人侦探的基本要求。“太丑或太好看都不行，不能有特征。”

私人侦探其实是个“舶来行业”。曾任某反贪局检察官的著名私人侦探郑刚介绍说，19世纪初，随着工业化、城市化程度的日益提高，西方一些国家贫富分化日渐严重，涉及公民财产与人身安全的犯罪与日俱增，警察没有足够精力迅速解决此类问题，为个人提供保卫及调查服务的私人侦探，便应运而生。

中国私人侦探发展始于1992年。上海著名刑侦专家端木宏峪退休后，开办全国首家私人侦探机构——“上海社会安全咨询调查事务所”。1993年初，辞去派出所所长职务的孟广刚，成立了一家“克顿调查事务所”侦探机构，成为“中国第一私人侦探”。

赵晓说，最初干私人侦探的多是端木、孟广刚这样的退休警察、退伍军人或律师，后来，越来越多的人被这一行的丰厚利润吸引，许多从未接受过专业训练的人也加入进来，从业人员才越来越杂。

【婚外情调查】收费从几千到上万

由于法律限制，我国其实一直没有真正的侦探公司。现在所谓的“侦探公司”，真实身份分商务调查公司、信息咨询公司两种。寻人、调查婚外情、盯梢“二奶”等技术含量不高的案子，占私人侦探行业收入的很大一部分。在很长一段时期内，私人侦探被冠以“‘二奶’克星”的称号。

家住颐和园附近的陈松，是一家小型调查公司的负责人，公司的一大半业务都是帮妻子调查丈夫的婚外情。每次接案子前，他都会要求客户出示身份证、结婚证等相关文件，反复核对客户身份，确认对方并非另有所图。之后，他会跟客户确认收费标准，一宗婚外情调查的案子，根据调查难度的不同，收费从四五千到上万元不等。



私人侦探的部分工作设备



2002年11月，某私人侦探正在寻找一位失踪少年。

【商业调查】酬劳高危险大

与家庭婚姻调查不同，打假、追债、商业调查等商务型案件的委托人常是大大小小的企业，调查对象不再是毫无防范意识的普通人。这类案子酬劳虽高，但难度和危险系数也较高，只有规模较大或资历较深的调查公司才有能力接。

据记者了解，为拿到有效线索，私人侦探十分重视资源的共享，各种调查也往往借助关系着手。有电信资源的人，能轻而易举获得通话记录；熟悉酒店业的人，能将摄像头直接装进客房；在医院有关系的，连别人堕过几次胎都能查出来。

办理商业调查案件时，私人侦探往往会使用一些特殊手段，如假扮成相关业务人员去“钓鱼”。“更难的是混进某个地方卧底。出发前，我们会清理全身，凡是会引起怀疑的名片、证件都要清理掉，针孔相机等拍摄设备则要保护好。有时，调查人员要混进工厂当工人，一边干活儿一边取证，还不能被人发现。”郑刚说。

【争议关键】“如何规范和管理他们的行为”

从1992年至今，私人侦探业在中国已有近20年的发展，但私人侦探们仍难以摆脱“黑户”的身份。1993年9月7日，公安部曾下发一通知，禁止开展私人侦探所性质的民间机构，因为这些机构的营业范围、权利义务等无法法律依据，但工商部门并未就此做出明令禁止。

“据我了解，全国各种性质、大小的民间调查公司有2500到3000家，专业调查员20万人以上，加上兼职和临时聘用人员，从业人员将近30万。”郑刚说。目前已有数十家海外私人侦探所在中国开办业务。

但身份上的不合法始终制约着私人侦探行业的发展，甚至影响到他们的自身安全。2003年12月13日，一位名叫黄立荣的私人侦探在一次调查过程中被殴打致死。陈松回忆说，早些年，某调查所在一次调查时，和委托人一起破门闯入当事人家中捉奸。证据是拿到了，但几位私人侦探却都被拘留，并被以私闯他人住宅、侵犯他人隐私等罪名起诉。

对私人侦探行业，法律界始终存在争议。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何家弘建议，应给私人侦探明确的法律身份。“只有让私人侦探变‘半地下经营’为‘地上公开经营’，才能有效引导其发展、规范其活动，他们才能以良性、有序的方式服务于社会。”

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曲新久则认为，私人侦探虽已客观存在并持续发展，但不可能也没必要以专门立法的方式承认他们的合法性：“争议之所以一直存在，无非因为他们在调查中使用了窃听、偷录等非法手段。因此，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规范和管理他们的行为。”

据《环球人物》杂志